

评第二国际初期在庆祝“五一”节问题上的争论

周 友 光

从一八九〇年(即第二国际巴黎成立大会通过庆祝“五一”决议后翌年)到一八九三年,第二国际内部在庆祝“五一”问题上,曾有过一场颇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是由英国尤其是德国在庆祝活动的日期、方式上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决定而引起的。英国每年的庆祝活动,是在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举行。德国的庆祝活动,有的时候虽在五月一日,但工人是在白天并没有普遍停止工作的情况下举行,或者是把庆祝活动安排在晚间;有的时候也和英国一样,把庆祝活动移到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与此同时,对英、德做法持反对态度的法、奥等党则坚持认为,各国每年的庆祝活动,均必须按一八八九年决议规定,不可移易地定在五月一日举行;并且还应该使这一天在实际上成为各国工人普遍的罢工日(一八八九年决议并无此项规定)。

在这场争论中,法、奥等党对英国、特别是对德国所采取的立场,是十分严厉和不予通融的。他们指责德国党“软弱”、“动摇”、“后退”,抱怨英国工人“动作太迟缓”,并且郑重其事地宣称“在这个问题上断然决定不后退”。由于他们的坚持,在一八九一年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中,不仅重申了各国必须在五月一日举行统一示威游行的规定,而且还作了如下补充:“建议举行示威游行的地方都停止工作”(附带指出,有的著作,如克利沃古斯、斯切茨凯维奇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简史》,以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曾通过可以把“五一节”游行改在星期日举行的决议,这实为讹误)。一八九二年,出席德国党的柏林代表大会的奥地利社会党代表阿德勒,公开发言反对会上通过的一八九三年五月一日庆祝活动将在晚间举行的决议。在一八九三年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上,同样由于法、奥代表的坚持,在有关决议中又规定:“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是争取五一节休假,并支持任何地方的任何组织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尝试。”

关于这几年的争论,在目前常见的共运史、世界史的专著和教材中,凡涉及者,也大都对英国、特别是对德国的做法,持批判的态度。它们指责德国党“没有执行‘国际’的决议”、“害怕牺牲”、“避免冲突”,企图使革命的节日变成吃吃喝喝的“聚餐日”,是“右倾机会主义”,只有法、奥等国的主张,才是“战斗的、革命的方式”,等等^①。显然,这些著述都把庆祝活动的日期和方式看成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把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做法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一个原则性分歧。

必须指出,无论是当年法、奥等党提出的指责,还是后人的更为苛刻的非议,都不能认为是公正的。鉴于这些看法长期流传并且似乎已经成为定论,所以,有必要把这场争论重新提出来加以评述。

对这场争论,只要我们回顾一下英、德两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同时重温一下恩格斯在相当多的书信、文章中所发表的明确意见,是不难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的。

首先谈谈英国的情况。英国的政治生活长期比较平稳,工人运动深受工联主义影响。虽

然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英国已经出现了一些非熟练工人的有战斗性的新工联,但总的说,工人运动才刚刚从它四十年的冬眠中觉醒过来,旧工联的反罢工意识还远未肃清。此外,还必须考虑到,从一八九〇年开始,英国已经受到了新的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这对于广大非熟练工人以及他们尚待巩固的工会来说,也是十分不利的。在上述条件下,要求刚刚有所觉醒的英国工人一开始就在五月一日放下工作,来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显然是难于办到的;即使勉强做到了,处于工业不景气的资本家,也一定会以此为借口,大批解雇非熟练工人,并且进而搞垮他们的工会。本来,艾威林夫人(即马克思女儿爱琳娜)和她的丈夫在开始的时候,也曾想根据巴黎大会的决议,于五月一日在伦敦组织庆祝活动,但是后来,如恩格斯所说:“在发现今年任何想在5月1日(星期四)举行这种示威的企图必遭失败以后,示威决定改在5月4日(星期日)这天举行。”②

英国工人这样做,并没有使他们的庆祝活动因而有所逊色。事实上,一八九〇年五月四日在伦敦的庆祝活动,是极为成功的。这一天,约有二十多万工人在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口号下,参加了马克思派所组织的集会和游行。高龄的恩格斯也豪情满怀地出现在海德公园庆祝大会的第四号讲坛上。事后,他还称誉这一天,是“四十年以来第一次再度响起了英国无产阶级的声音的星期天”③,对伦敦的庆祝活动极表满意。基于同样的原因,一八九一、一八九二、一八九三这几年伦敦工人的庆祝活动,均照样在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举行(一八九二年的五月一日恰好是星期日),每年的庆祝活动也都十分出色,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达六十万。恩格斯也照样出席了每年的盛会,而从未有过异议。由此可见,对当时的英国来说,在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举行庆祝活动,是符合它的实际情况和得到恩格斯支持的,也是成功的。我们对此没有理由加以责难。

德国党在庆祝活动的日期、方式上的决定,有比英国还更为复杂的原因。大家知道,一八九〇年,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年头。这一年的二月二十日,德国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了空前的胜利,随后,俾斯麦被迫辞职下台。从当时的情况看,到这一年九月三十日期满的“反社会党人法”,已难于再延长下去了。可以预期,倘若这个实施了十二年的反动法令一旦废除,德国工人运动就一定会获得更加蓬勃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德国统治阶级并不甘心于失败,他们为了挽回局面,正在竭力寻找挑衅的借口,以便对工人实行武力镇压,重新把工人运动打下去。此外,德国和英国一样,也是新的世界经济危机首当其冲的国家,德国资本家同样会乘机大批解雇工人。

在这种政治、经济形势下,理所当然地需要德国党在庆祝“五一”问题上采取慎重的态度,因为只有这样,德国工人得来非易的成果,才能够保存下来并且得到进一步的扩大。

德国党在策略上需要慎重,还与当时党内和工人中的思想状况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巨大胜利,不少人头脑开始发热起来,一八九〇年,党内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左”倾机会主义派别,即“青年派”。早在三月二十三日,柏林的“青年派”就发表了一篇题为《五月一日应当发生什么事情?》的呼吁书,号召各地工人在五月一日举行总罢工,并且别有用心地指责德国党的领导奉行机会主义。在他们的煽动下,许多工会和工人集会都作出决定,将在五月一日举行罢工。但是,在五月一日举行罢工对当时的德国来说,显然是不适宜的,因为它将会给反动当局提供求之不得的挑衅的借口,也使资本家能够借机实行同盟歇业。其结果,将会使德国形势急转直下地恶化起来。

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于四月十三日,才在哈雷会议上通过了由威廉·李卜克内西起草的《告德国男女工人书》,呼吁工人们五月一日采取克制的态度,在凡能引起冲突

的地方都不要举行罢工，而采用合法的方式，如组织群众大会、会议、征集签名的国会请愿书、和平示威游行，来庆祝“五一”。结果，“青年派”的有害鼓动基本上被制止了。一八九〇年五月一日这一天，德国各地工人在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和要求实施劳动保护法的口号下，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除汉堡外，普遍都没有实行罢工。

究竟在五月一日举行罢工对德国是否适宜，汉堡罢工的结果回答了这个问题。汉堡是德国工人最有组织、党和工会的经费最充裕的地方，被称为德国工人运动的要塞和精锐部队。在罢工发生后，资本家果然实行同盟歇业，并宣布今后将不再雇用参加工会的工人，这次艰苦的罢工直到七月才告结束。为了救济大批失业工人，汉堡党组织和工会总共付出了十万马克，几乎耗尽了它们的全部经费，工会活动也很长时间陷于瘫痪。事后，尽管“青年派”把汉堡罢工的失败归咎于党的领导，但是，在八月格累斯顿、马格得堡、柏林等地的工人集会上，绝大多数工人都反对“青年派”，对党的领导在庆祝“五一”上的决定表示拥护。

一八九一年，德国政治形势仍然紧张，工业不景气的情况更加严重，加之汉堡罢工的教训，故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团于一月二十八日决定，建议这一年的庆祝活动移在五月第一个星期日举行。一八九三年，由于德国国会因拒绝政府的军费法草案而被解散。国会的重新选举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占着首要地位，因此，如上面已提到的，党的柏林会议作出了把“五一”庆祝活动安排在这一天晚间举行的决定。

恩格斯对德国党历年的决定，除了在个别细节上有所批评外，也都是完全赞同的。他曾明确指出，一八九〇年哈雷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唯一符合局势的意见。汉堡事件完全证实了它的正确性”。对一八九一年德国党的做法，恩格斯认为：“对德国人来说，这样做几乎是绝对必要的。”^⑤一八九三年，恩格斯又指出，德国党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⑥。

事实很清楚，德国党在庆祝“五一”问题上的决定，并不是出于机会主义的需要，而是出于策略上需要慎重的考虑。德国党这样考虑和处理问题，不仅是对本国而且也是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负责任的表现。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对整个欧洲和美洲的义务，不是使自己遭受失败，而是时机一到，在首次大战役中获得胜利。我们要使其他一切都服从这个考虑。”^⑦因此，德国党的做法，也完全应该加以肯定。只有相反的策略，即要求德国党采取孤注一掷的做法，才是应予否定的。

诚然，德英两国在庆祝活动上的做法，同第二国际巴黎大会和布鲁塞尔大会的有关决议，是有所抵触的。对此，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呢？

巴黎大会关于庆祝“五一”的决议，表达了各国工人的切身利益和他们增强国际团结的愿望，无疑是一个光辉的历史文件，也是第二国际的一大贡献。

然而，每一个国家究竟应该怎样庆祝“五一”，在巴黎大会召开的时候，毕竟还缺乏具体的经验，而且在会上也没有就此作过深入的探讨。因此，这是一个有待以后实际经验来进一步回答的问题。

一八九〇至一八九三年的实践表明，各国工人在庆祝活动上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因为在他们的庆祝活动中，都体现了巴黎大会有关决议的内容和战斗精神。同时，这几年的实践也表明，要求所有的国家都在同一天采取同一方式举行庆祝活动，是不可能做到的。

关于庆祝“五一”的问题，恩格斯当时曾指出，如果各国都能在同一天停工，那当然很好，但是当不能做到的时候，也就不要为了追求“纯粹形式”和“戏剧性的后果”而“强求一致”。遗憾的是，第二国际一些党的领导人并没有根据实际经验和恩格斯的教导，对个别国家的不同做法给予谅解、通融，而是采取僵硬的态度纠缠不放。在布鲁塞尔大会上，他们为了对德国

党施加压力，还进而在有关决议上，补充了停止工作的内容，应该说，这样做就更不切实际了。

第二国际初期的这场争论告诉我们，国际工人运动在开展联合斗争的时候，必须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充分尊重各个国家的党根据本国实际而作出的独立判断，注意求同存异。与此相反，刻板地要求所有国家都按一个模式行动，那对于各国无产阶级事业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都将会是有害而无益的。今天，我们总结这场争论的历史经验，应该以历史的实际为根据，如果只从有关决议的某个具体规定出发，对于不同的做法进行种种责难，甚至人为地把它拔高，提到原则的高度，那是不可能总结出真正的历史经验的，也是不会使人信服的。

最后要指出的是，有关著述之所以对德国党持特别苛刻的态度，恐怕与这一时期德国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滋长和德国党后来变修这种情况有很大的关系。这一时期德国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滋长，确实是一个严重的现象，但与此同时，德国党内“左”倾机会主义与“左”倾情绪的存在，也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德国党的蜕变和随之出现的“五一节”日益丧失战斗性的情况，则是以后才发生的事。在第二国际初期，虽然德国党的一些领导人也犯过若干右倾的错误，但整个说来，德国党仍不失为一个有战斗力和有贡献的党。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把德国党根据实际情况同时也是针对“左”的倾向而作出的决定，也加以否定甚至打上右倾机会主义的标记。在这方面，恩格斯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当时，恩格斯已经以很大的精力从事反对第二国际尤其是德国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但他并未因此就忽视“左”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情绪的危害性，即使是在如何庆祝“五一”这样一个具体问题上，他也语重心长地指出，倘若处理失策，也会招来“毁掉一切”的后果。因此，尽管恩格斯对德国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批判，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庆祝“五一”问题上，对德国党的正确决定采取支持的态度。第二国际早期的历史比较复杂，在评价象德国党功过得失这样的重要问题上，我们无疑应该努力遵循恩格斯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具体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

注释：

① 可参阅克利沃古斯、斯切茨凯维奇《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简史》第141、145页；连茨《第二国际的兴亡》第22至25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编写组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第2卷，第392、395页；上海师大《世界近代史》下册，第94页等。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7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0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7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33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9页。